

■特别报道

2014,大健康产业风生水起

2014年被认为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元年。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大健康领域的服务内涵和发展方向。2014年,一系列围绕健康医疗服务的相关政策纷纷出台,产业技术创新如火如荼,市场探索愈加深入,产品形态智能、多元、方便,大健康服务行业的边界在广度上不断延伸,硕大的产业“蛋糕”逐渐聚合并形成雏形。

在医药产业,伴随着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一体化,研制防控埃博拉病毒、流感病毒及乙肝等病毒的疫苗成为保卫人类健康安全、“净化”地球村环境的重要手段;国内防治各类疾病的新药研发推陈出新,强仿药价格更接近本地市场需求,生物药创新有望突破国际前端;在治未病及慢病防御上,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和养生理念亦逐步回归本源;医疗器械产业从政策到市场应用,为国产设备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挺进而背书,同时,在医疗服务中毅然担起大梁;被移动互联网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的人们,享受着健康管理所带来的高质量生活;在食品安全领域,相关检查监测技术手段与时俱进,科普教育更加全面广泛。另一方面,持续多年的医改在深水期中徘徊已久,人们期待着具创新特色的“破冰之旅”,能以“中国模式”为世界各国医改的和谐渐进“导航”。

如今,大健康产业帷幕已经拉开,好戏纷纷登场,其人物扮相多姿,水袖善舞;其故事曲折连绵,冲突不断。展望2015年,时空更迭中,令人畅想无限……

医药产业发展“三境界”

□ 本报记者 项铮

在2014年工信部发布的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上,仍是广药、扬子江等企业占据前几名。主营收入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由上届的9家增加到11家,其中,排名前两位的广州医药集团、修正药业集团的主营收入双双突破400亿元;另外,主营收入在50—100亿元之间的企业则由上届的19家增长到25家,主营收入50亿元以下的由上届的72家降低为64家。百强企业的门槛已经过20亿,平均规模水平亦明显提升。2014年中国医药工业生产增速虽然高于国内工业平均水平,但增速回落较明显。

移动医疗市场火热

2014年,移动医疗产业遍地开花,不仅传统的医疗公司纷纷涌入,新成立的移动医疗公司数不胜数,可穿戴医疗、网络轻问诊模式均有企业尝试,甚至睡眠产品都在嫁接移动医疗概念,他们有的获上亿元投资,有的仅凭几百万投资便进入市场,希望在移动医疗领域分一杯羹的公司比比皆是,火遍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然而,移动医疗的未来在哪里?最终付费方是谁?是保险公司,还是医药公司?目前尚在探索中。

移动医疗未来的产值多大?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得清移动医疗的盈利模式,但是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移动医疗拥有美好的前景,但在懵懂中前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移动医疗的现状和十年前互联网的时候差不多,随着医疗生态链逐渐建立,移动医疗必然迎来辉煌的明天。”

国产医疗器械面临大好机遇

2014年,国产医疗器械利好消息频出。随着国内医疗器械公司的崛起,上半年开始,国家相关部门对于本土企业实施扶持政策。推动国产医疗设备应用成为医疗器械业内重要的话题。

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信部联合召开推进国产医疗设备发展应用会议并指出,目前国内医疗设备需求、市场扩大,国产医疗设备企业应抓住机遇,做大做强,推进健康服务业快速发展。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倡导卫生计生机构使用国产医疗设备,重点推动三级甲等医院应用国产医疗设备,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国产医疗设备产业水平整体提升,提高产品性能。

随着中国本土医疗器械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中国医疗器械新政策的出台,一些外资企业也调整了在华发展策略,他们采用并购、合资、转移技术等方式希望保持在中国一线城市优势地位,同时利用中国本土企业在二三线城市的销售渠道进入中国的基层医疗市场。

“如果国内医疗器械研发创新能力不提高的话,跨国企业不会将技术分享给中国公司,”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只有我们强大了,让跨国企业认识到国内企业的优势,才有可能有双方的平等合作,目前正是国产医疗器械企业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尽快转型升级的好时机。”

药企知识产权官司频发

2014年,广药集团是药企大赢家。10月,广药上市ED药品——金戈,这是国内第一个“伟哥”首仿药,金戈高调上市,力求成为广药未来主打药品。年底,广药王老吉与加多宝的官司终于有了结果,经裁定,“王老吉”的法定拥有者是广药集团,同时赢得1.5亿元赔偿。同时,广药集团表示,此案判决的1.5亿元赔偿款到位后,将全部投入中华老字号王老吉校园公益基金,力推中华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4年,恒瑞制药的创新药官司颇令人瞩目,研发创新药也引发了恒瑞和跨国药企的知识产权之争。12月,恒瑞在网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某法院同意了撤销起诉的动议。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礼来公司两名前雇员被指控向中国的竞争对手恒瑞医药泄露价值5500万美元的商业机密,礼来是全球制药研发龙头,而恒瑞医药是国内创新药领军企业。两公司现有产品和在研产品均覆盖肿瘤、心脑血管、糖尿病、骨质疏松和抗感染等,其中部分产品有所重叠。恒瑞医药也和赛诺菲打过官司,2003年恒瑞医药绕过专利,在国内强仿赛诺菲的一线化疗药多西他赛,赛诺菲将恒瑞医药告上法庭,后者二审胜诉。

业内人士分析,恒瑞惹上这些官司并不偶然,这也是中国药企实力逐渐强大的例证,在中国制药企业从仿制向创新转变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多的面临专利战拉锯,跨国起诉、垄断处罚和商业合规变革等一系列的行业法则颠覆。

本版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合办

中医药:一场关于科学的争论

□ 本报记者 罗朝淑

回望2014,中医药界的故事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中医药学到底是不是科学?这个争论始于年初,“爆料”于年中,却在年底出现了戏剧性的定论。

2014年新年伊始,一群反中医人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反中医大会”,不仅打出了“爱生命·反中医·信科学·去愚昧”的横幅,全盘否定中医的科学性,而且还再次提出了“废医废药论”的主张。

一位与会者在发言中说,“中医消磨了国人的理性思维,摧残了民族的科学素养”。他认为:“上海第一届反中医大会,打响了草根科普爱好者群体讨伐中医药的第一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然而,这个反中医大会举办的消息却引来了诸多网友的关注,大量网友留言反对这些“草根科普爱好者”的言论。有网友认为,“能治好病有很多途径,不怕中医是伪科学就怕科学是伪真理”。

年初的这场反中医大会,结局不仅没有达到反中医的效果,反而是挑起了公众对中医药的热爱和关注。

年中,除了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的一番言论被一些媒体炒作误读以外,一场关于脉诊论争的“挑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微博名人“烧伤超人阿宝”发起挑战,愿出奖金5万,以随机盲法测中医脉诊准确率是否能超

80%。该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

脉诊论争挑战事件发生后,《中国中医药报》最先在官方微信回应发送文章《中医气魄:回应“脉诊论争”挑战》,《科技日报》也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刊发了《从“脉诊论争挑战”说开去》的评论。但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却不断挑起双方矛盾,制造舆论。

然而,新浪网在随后发起的一项关于“脉诊论争”挑战的网络民意调查却显示,有74.2%的网友支持中医,20.4%的网友支持“烧伤超人阿宝”,5.4%的网友选择中立。随着挑战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本次挑战毫无意义,希望停止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似乎是为了回应这一年有关中医药是否是科学的争论,2014年岁末的11月24日,中国农工党中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第一届“中医科学大会”。这次会议以“中医药——国家战略资源”为主题,以“科学认识中医药,促进中医药传承和创新”为宗旨,邀请了中西医药界各路顶级专家出席了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在会议上的讲话被媒体广泛报道。陈竺认为,中医药防患于未然的理念和系统论、整体论的认识特点,已为现代医学理论所接受,不仅适用于医学,亦可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借鉴,应当借助现代学术语言实现对

中医药学的解读和发展,要加快传承与创新步伐,促进中医药学术进步。他认为,如果能够将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与现代西方医学结合,有望给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更为重磅的一个消息是,进入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份,12月19日,Science竟然出版了一期中医药专刊。该期专刊编发了《世界卫生组织2014—2023年传统医学战略视角》(一个全球性的科学挑战:从古代治疗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是否永远不相容?》(证:一个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系统生物学方法)等多篇文章。美国科学促进会CEO、Science杂志出品人Alan Leshn博士称:“传统医学的研究者正在试图通过现代组学和最新的技术来规范传统治疗方法。”

Science出版的这期中医药专刊,在新年到来之际,为争论了一年的问题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首届中医科学大会上指出的那样,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惠及东方、影响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充满着古代智慧和哲学思想,为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哲学理念和应用选择。

但愿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中西交融。

北京医改交出成绩单

□ 本报记者 李颖

自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医改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里,北京下大力气啃“硬骨头”,这一年医改的各项举措有可圈点之处,但效果仍与预期有差距。

那么,医改到底有哪些得失,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多元化办医取得进展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加剧了看病难,目前主要的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为改变公立医院一家独大的局面,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公立医院无序扩张,并加大对社会办医的支持力度,鼓励发展非公立办医。2014年,国家在鼓励多元化办医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

在放开社会办医方面,北京走在了前面。2014年3月,北京市出台《社会办医指南》鼓励医生开办诊所,取得医师以上职称,连续从事五年以上同专业的临床工作的医生可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开设诊所。同时,外资独资办医方面的政策也取得突破。同年8月27日,卫计委和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7个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在此,外资办医70%的控股比例上限被取消,开办外资独资医院的审批权限也被下放到省级。

尽管社会办医得到鼓励是好事,但要真正让办医落到实处,还要突破三重限制。首先是审批,层层审批加大了社会资本办医的成本和时间。其次是金融、土地、保险等方面,缺乏细则,尤其在医保制度、人事制度方面社会资本办医还有诸多限制。此外,还包括区域规划和医疗器械购买限制。在这些方面政府还有许多事要做。

自由执业给医生“松绑”

2014年7月22日,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医师多点执业实际上是为了给医生“松绑”,把医生从“单位人”逐渐解放为“自由人”的过程。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多点执业将有利于调动医师执业的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统筹调配本市医疗卫生资源,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本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配置不尽合理的问题。

但是,无论政策取得多大突破,目前的医生仍是“单位人”,受到“体制”的局限。因此,想要真正实现自由流动,还要在人事制度上进行改革。

医药分开的北京模式

“医药分开”改革试点已初步拟定新的推广方案,首次提出将引入“分级”理念,即统筹考虑一、二、三级医院,分级制定不同的价格、报销政策,总体考虑让老百姓在基层看病比大医院更便宜。且所有在京医疗机构都将纳入“医药分开”改革。北京市医改办表示,根据新方案思路,“医药分开”的推广将不再是市属大医院层面的铺开,而考虑到了二、三级医院之间的纵向关系。这些不同级别的医院或将在实施“医药分开”的同时,调整拉开价格差距。

这意味着,北京新版“医药分开”推广方案将试图纠正“价格洼地”所带来的倒吸病人的效应。

挂号优先医联体内部需求

2014年底,北京市已在五环路周边地区初步规划了33家医院或院区构成的环五环医疗服务带。今后,北京五环路内原则上不再批准建立政府办综合性医疗机构,严格控制政府办医院向社会提供特需服务的数量和比例。把更多的增量交给社会资本举办。即便是社会资本办医,也要遵循资源设置规划。

不过,考虑到三级医院整体搬迁成本高昂,影响涉及面广、配套设施需求大、历史文化留存等因素,仅对极少数部分医院实施整体搬迁,主要采用三级医院创办分院、提升扩大分院服务能力和规模、压缩中心城区院区规模等步骤,逐步实现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的向外疏解。

下一步,北京将细化分级诊疗制度,比如通过医联体内部的挂号系统实现转诊优先,医院只有在满足医联体内部需求之后才能外放号源等,以此调节大医院拥挤的门诊量。

出了三大新趋势:一是食品安全的风险来源更加隐蔽,食品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现有的监管技术和检验检测能力;二是互联网食品交易市场兴起,但监管能力尚未跟上,网售食品安全问题开始凸显;三是食品安全已不仅仅是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的问题,土壤、水、空气等环境污染正在对食品的源头产生严峻威胁。

专家认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一要引入社会共治和市场机制的大监管体系意识,探索建立多层次监管体系,运用“黑名单”制度,强制责任保险、产业政策等,让市场机制在食品安全保障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践行食品安全精细化监管,将食品安全监管与普通商品监管严格区分开,对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细分;三是进一步厘清各级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分配,提升地方政府责任意识和基层一线的监管能力。

应该看到,食品安全的治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细致的过程,虽然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大规模、系统性的风险有所降低,食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从治本角度看,还任重道远。2014年12月,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再次向全国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中国食品安全的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当地时间2014年12月24日,解放军第二批援塞“抗埃”医疗队队员霍翠华和杜宁在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度过了自己40岁和46岁的生日。没有亲人在场,却有战友和非洲同事们的祝福,他们激动地说:“这个战地生日具有特殊意义,将让我终生难忘。”



可穿戴设备应用,使健康得到精准管理



新的北大国际医院倡导新的运营模式,为医改探路

食品安全需社会共治

□ 本报记者 张林军

行,已向城市管理平台上猪肉流通数据220万余条,形成完整的猪肉流通追溯链条。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有定论

近年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挺转派”与“反转派”一直争论不休。2014年的“发展与食品安全论坛·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业”、第二届亚太食品安全治理圆桌会议等由学术界组织的食品安全会议,也都围绕转基因与食品安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4年10月,农业部官员表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已有定论:“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据介绍,我国转基因产业链条中,包括科研院所、国内企业、国外大型公司等。转基因研究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资金支持,评审制度由政府组织第三方权威机构和科学家团队进行评价,审批部门同样为政府部门,负责批准发放安全证书和品种审定证书,涉及到国务院国际联席会议、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第三方检测机构等。

安全监管:任重道远

2014年7月,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大量使用过期、变质、次品原料生产快餐所需食品。媒体调查发现,福喜公司主要存在三大问题:违规篡改生产日期(多的延期达一年)、将过期或变质原料回炉后生产,以及将次品混入合格产品中出售。有媒体统计,过去的5年里在华洋快餐店已经曝出至少17起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不禁感叹,洋快餐说好的安全去哪儿了?相比于门店数量在中国的快速扩张,其监管还远远没有跟上。

2014年12月,江西高安病死猪黑色产业链被曝光。这些病死猪肉销往广东、湖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7省市。从注水猪到瘦肉精再到病死猪,猪肉问题常出常新,而与此伴随的是监管部门松懈、麻木乃至“配合”,这不得不发人深省,让我们感到食品安全事件仍比较严峻。

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为何会让公众感到担忧?专家分析认为,2014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暴露